

表情北京

“市总工会应立即从太庙中迁出,然后太庙归市政府文物部门管理……”前日,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专题座谈会上,市政协委员、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刘绮菲就文保问题两次举手提建议。会后她说,之所以第二次举手,是因为此前的话没说完。这是她最后一次作为市政协委员提问,“退了以后觉得真有遗憾……”她说。



前日,政协专题座谈会上,委员刘绮菲正在倾听其他委员发言。

本报记者 薛珺 摄

“政府部门解决不好问题,我就急”

政协委员刘绮菲关注文保问题,称市总工会应立即从太庙中迁出



在楼道里,记者拦住刘绮菲,说明采访动机。她说:“能不能先让我上个厕所?开了一下午会都没机会去。”说罢,径直朝厕所方向走去。“那是男厕所!”眼看她冲着男厕所过去,记者赶紧喊了一声,“哈哈,我都快忙晕了!”她笑声爽朗。



“这些‘关键词’有没有对应你性格的?”记者把写好的命题给她看。刘绮菲想了想说:“当委员10年了,没有人说我极端,我都是就是论事,有些时候看到能解决的问题,政府部门却没解决好,我就着急。”



刚开完小组讨论会,她说,不赞同刚才一位委员的发言,要不是会议马上结束了真想跟他理论下去。说这话的时候,走廊里委员们来来往往,她嗓门洪亮,旁若无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自掏腰包调研组织专家座谈

新京报:你第一次成为政协委员是哪一年?
刘绮菲:我是“非典”时期进入政协的,是政协十届,已经是10年的老委员了。
新京报:但你看起来不老。
刘绮菲:我算算,还有不到半年就65周岁了。
新京报:看你总是急匆匆的。
刘绮菲:是啊,我这一天基本都在开会,来回跑提案,大家说我跟疯子似的。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有如此大的动力?
刘绮菲:责任感、使命感吧,他们问我累不累,其实我会累,但不觉得这是

负担,我喜欢这些工作。
新京报:政协委员的工作要付出很多时间?
刘绮菲:何止时间,我还会自己掏钱调研,还会组织专家座谈。
新京报:自己出钱?
刘绮菲:我周围有很多专家,在调研的时候会请大家来帮忙,比如我自己掏钱做速录。我觉得政协委员就是要建言献策,但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用好自己的资源,把好的声音吸纳进来,通过这个平台传递给政府。人不能只为利益活着,活着就要创造价值,我觉得我创造了一种社会效应就满意了。

不满提案回复 委员急了

新京报:有一直关注的问题吗?
刘绮菲:听证问题,我们现在的听证环节不透明,程序也不好。
新京报:多次提出这个提案,能办复吗?
刘绮菲:都有提案回复,但是我不满意,就一直提。
新京报:委员中有人说你较真儿吗?
刘绮菲:应该说是认真,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新京报:你的认真有什么具体体现?
刘绮菲:花市拆迁当时找到我了,我义不容辞去调研,组织学生做了很深入的调研报告,通过当时

政协的领导转到到有关部门。后来回复了,老领导拿给我看,当时我脑袋就炸了,回复写着已经找刘委员说明情况,刘委员十分认可和满意。
我当时就说,他们根本没找我谈,这不是明着骗人嘛!不能办就说不能办,这样回复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后来政协很重视,又把意见转交了。
新京报:得到解决了吗?
刘绮菲:后来有关部门来了好多人到我家道歉,我没给好脸。后来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我今年继续提了一个“解决好花市拆迁遗留问题的提案”。

爱管事抢回60亩绿地

新京报:邻居会找你帮忙解决问题吗?
刘绮菲:那倒没有,我在小区很低调,因为得罪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住在哪里。
新京报:你提出的问题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
刘绮菲:那倒不是,有一年我的提案还为花家地那边抢回来一片60亩绿地呢。
新京报:是提案有作用吗?
刘绮菲:那边原来是很大一片绿地,有一天我路过那里,发现被围起来做高尔夫练习场了,当时我就很生气,因为我知道那片地是园林的。当年我就写了提案,就在政务咨询会上,有关部

门的领导正好在,当场表态要回去查,当年那个工程就叫停了。虽然停工了,但没有恢复植被,我第二年就继续提案,要求恢复原来的植被景观。
新京报:你又开始追着不放了。
刘绮菲:这算是我在政协工作中最立竿见影的一次提案了,后来恢复得特别好。
新京报:从政协退了以后还会继续这么忙吗?
刘绮菲:该休息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打算把在政协的10年写成一本书,我的一生也值得写。
本报记者 郭超

5年话履职



委员宋大川接受记者采访。本报记者 薛珺 摄

九年九次提案 只为地下文物保护

政协委员宋大川表示,希望新委员继续呼吁地下文物立法

委员呼吁“要动土,先考古”

与前八次政协提交的提案相比,本次政协提案,宋大川的提案虽然还是保护地下文物,但内容略有差别。此前,他一直呼吁出台地方法规;本次,他提请制定政府文件。
“立法,也许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行政机关的政府文件应该很快”,他说,五年届满,他不知道是否会再次当选,这次也许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最后一次呼吁“要动土,先考古”,所以他希望“速战速决”。

宋大川的话不多,小组

讨论时多数时间他都在听其他委员发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场合他更安静。可只要提到地下文物,他就会滔滔不绝,而且一改平时的平稳语气。

一个人的声音变成几百人的声音

在宋大川眼中,古都北京的地下世界是一个聚宝盆,“地上文物记录了千年,地下文物是几十万年”,他说。可在他脑海中,同样有一笔地下文物损毁账: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发现文物后继续施工;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发现清代御路仍继续施

工,直到无法施工,破坏了100多米长的清代御路;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工程建设中发现古墓,部分出土文物不知去向……他曾经数次出现在这些文物损毁现场,恨自己到的太迟。
“所以,立法,制度化,才是保护地下文物的根本之道”。宋大川回忆,2003年第一次提交关于奥运场馆地下文物保护的提案时,立即引起市政府的重视,20余奥运场馆的地下勘探立即启动,1500多件文物随后出土。当时,他以为地下文物保护立法也会延续这个速度。可是,喊了9年,直至目前法规还在酝酿中。

“9年,最欣慰的是,当初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后来地下文物保护立法提案两次上了市政协的建议案,整个政协的力量在推动,变成了几百个人的声音”。宋大川说,9年来最欣慰的事情,同时也是最遗憾的事情,“2009年地下文物保护立法就已进入了立法调研阶段,但法规至今还未出台。”
宋大川说,如果自己不能连任,希望还有新委员继续跟踪地下文物保护立法,“哪怕不立法,不制定政府文件,只要在现行的政府规章里加一条也好——地下考古勘探是项目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

本报记者 王姝